

古人如何注重家教家风

□ 刘余莉

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，欧洲学者一直在探讨：为什么中华文明得以承传，并保持了五千多年经久不衰？经过研究，他们得出结论：那是因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的结果。历史证明，这个结论是合理的。

注重家教家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

修家谱、祭祖是重视家教的具体做法。家谱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文化传承，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家庭祭祖，是孝敬的延续和弘扬，是家教、家庭道德的表现，传承家训的机会教育。而祭祖可以敦厚民风，传承祖德。《论语》中强调：慎终追远，民德归厚矣。试想，一个人连远祖都念念不忘，想着定时祭祀对于眼前的父母又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？

祭祖除了要“依时依礼”之外，最重要的要有内心的虔诚，做到“必诚必敬”。《群书治要·礼记》中说：“夫祭者，非物自外至也，自中生出于心也。心怵而奉之以礼，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。”可见，祭祀并不是外在的人事物所要求的，而是源于人内心对父母祖先的感念之情，这种内在的感念之情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祭礼。既然祭礼是对父母祖先内心感念之情的外在表现，必须具备诚敬之心。因为祭礼能长存孝思，培养人的恭敬心和不忘本的厚道情谊。人心厚道，懂得见得思义、知恩报恩，社会风俗自然就变得醇厚，而不是见利忘义、忘恩负义。

祭祖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昭述祖德，以此传承家风、家道、

家文化。古来用于祭祖的宗庙，天子有七庙，诸侯有五庙，大夫有三庙，士人有一庙。庶人（平民）没有庙，但是家家户户设有祠堂，供奉祖先的牌位。每到祭祀的时候，全家族的人被召集在祠堂之中，听讲祖先的德行。例如，在哪朝哪代，家族中出现了哪位有德行的祖先，对国家、人民有何贡献。作为后代子孙，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，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行为祖先抹黑。东汉太守杨震不收“四知财”的德操，教育子孙秉持了其廉洁作风，后代出现了“四世三公”的盛况。可见，古代的反腐倡廉教育，早在家庭之中就已开始。这样，祭祀成为道德教育的场合，提起人对祖先功德的恭敬之心、思慕之心，培养了对家族的责任感和传承家族文化的使命感。

在古代，由于重视家庭教育，使得上百人的家族，能于生活中自然形成“父子有亲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”的天然秩序。使家庭成员在平等和睦、真诚友爱的气氛中，获得稳定安全的归属感；对父母长辈克尽养老送终之责；确保儿女晚辈健康成长，接受伦理道德教育；平辈兄弟间互敬互爱、互助合作。这是传统中国家族、社会自然的凝聚力。

重视从家庭开始进行道德教育至今仍具合理性。因为人一出生，首先面对的就是家庭关系。正是在家庭中，孩子从父母身上，学会为人处世、待人接物的原则和态度。如果孩子在家接受了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，懂得孝敬父母、友爱兄弟、尊敬长辈，形成谦恭有礼、严谨诚信的态度，培养起孝悌忠信、

礼义廉耻的品德，走上社会自然知道如何与领导、同事乃至陌生人文明相处、和谐交往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世界冲突的根源在家庭，在于家庭之中父子、夫妻、兄弟之间的冲突。

妇女在树立家风中的独特作用

中国人对家教的重视始于胎教。文王的母亲太任在怀孕时，就特别重视胎教。史书记载：“周太王少子季历，娶太任。太任之性，端壹诚庄，惟德之行。及其有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傲言，能以胎教子，而生文王。母子皆圣也。”因为文王的母亲是一位圣人，所以才能够言传身教把文王培养成圣人。而文王的祖母太姜、夫人太姒也都是圣母，与太任一起被称为“三太”。正是“三太”从重视胎教开始重视家教，奠定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，也使得后世男子把配偶尊称为“太太”，目的是期许对方培养出圣贤子孙。

中国古人的家庭教育从胎教开始，贯穿了人的一生，直到“慎终追远”。古语讲：“闾閻乃圣贤所出之地，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。”孔子、孟子、欧阳修等圣贤人的出现，都是因为从小在家庭中就接受了良好的母教。

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男女在人格上是平等的，但在家庭的职责分工上有差别。用现代话说，就是男女的社会角色、职责、分工各有侧重：男子创造经济收入，使家人衣食无忧；女子教育子女，使儿女具备良好的家风、家业承传下去，这就是男女有别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

大”的“无后”，不仅是指没有儿子，更重要的是指没有承传事业的后继人才。所以古人强调：“至要莫如教子”，提醒家庭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把儿女教育好。而《学记》的“教也者，长善而救其失者也”，《说文解字》的“育，养子使作善也”，都把对儿女德行的培养视为家庭教育的基础。而良好有效的道德教育是以身作则，所谓“言教者讼，身教者从”。因为儿女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最长，所以教育子女的责任主要由母亲来承担。

因为男女职责上有分工，所以对他们道德要求也各有侧重，即“夫义妇德”。男子必须有恩义、情义、道义，不能见异思迁，因此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的宋弘作为讲恩义的典范一直传颂至今，而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则为人所不齿；女子必须具有谦虚礼敬、勤俭持家等德行，这样才能言传身教，把儿女教成圣贤君子，使家业隆盛、代代相传。在这种意义上，女子的责任更为重要，因而也必然受到尊重。《孔子家语》中说：“昔三代明王，必敬妻子也，盖有道焉。妻也者，亲之主也；子也者，亲之后也，敢不敬与？”因为良好的家庭母教对家庭教育、社会和谐、天下太平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正是传统文化重视发挥妇女在家教中的作用，才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，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绵延不绝。

以良好的家教、家风促进廉洁修身

古人持家治国，可谓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”，人家欲兴，必由家

规严整始，人家欲败，必由家规颓废始。如《颜氏家训》《了凡四训》《弟子规》等，都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家规。

齐国的宰相田稷，做了三年宰相之后，回到自己的家乡。他拿出百镒黄金来侍奉他的母亲。母亲问：你怎么有这么多金子？田稷回答：这是我三年累积的俸禄。母亲说：你当宰相才三年，怎么可能存这么多钱？你这样当官，不是我所希望的。孝子只要尽心尽力、真诚侍奉父母就够了，不义之物是不能带进家的，会让你当宰相，你应对得起国家的栽培之恩。母亲让他赶紧离开家，并将此事加以弥补。田稷非常惭愧，就把钱归还公家，并主动请君主治罪。齐王佩服其母贤德，赦免了田稷，而且让他再做宰相。因为齐王体会到，这样的母亲教导出的孩子，德行一定是有根基的，做错事是一时糊涂。所以齐王再施恩给他，并把这百镒黄金赐给田稷的母亲。

古人讲“贤内助”，指的就是家中的母亲和妻子。母亲不仅要把孩子养大，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廉洁不贪等德行。妻子也要能“助夫成德”，而不能利欲熏心。这样家道才能端正。每一个家的家道都端正，天下自然安定。



诸葛亮博采各家学说之长，以儒法道为其治政核心，为刘备事业壮大作出巨大贡献。在诸多贡献中，诸葛亮独特的用人观被后人称道。范仲淹评价说：“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。用人者莫不欲尽天下之才，常患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也，能用度外人，然后能周大事。”

举贤任能

诸葛亮对人才任用有很高的见解。他把举贤任能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来认识。诸葛亮说：“治国犹如治身，治身之道，务在养神，治国之道，务在举贤。是以养神治身，举贤求安。”通过比喻，诸葛亮告诫世人，举贤可以让政权安定，正如养神可以实现身体健康。诸葛亮在开府治蜀过程中，非常注重贤良之才的选拔重用。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辟尚书郎蒋琬及广汉李邵、巴西马谡为掾，南阳宗预为主簿，皆德举也。”

诸葛亮事无巨细地操持蜀国要务，锻炼出过人的识人能力。诸葛亮赏识蒋琬，是基于对蒋琬才华堪当宰相的判断。蒋琬初任广都长的时候，刘备突然造访广都，看到蒋琬“众事不理，时又沉醉”，非常生气，“将加罪戮”。对蒋琬能力非常熟悉了解的诸葛亮进言刘备，认为蒋琬是社稷之器，不是“百里之才”，替蒋琬求了情。刘备因敬重诸葛亮，没有治蒋琬的罪。等到诸葛亮主事，征召蒋琬做东曹掾，逐渐将蒋琬推向政治前台，成为诸葛亮的得力助手。诸葛亮外出征伐时，蒋琬总是能够提供充足的食物和武器，被诸葛亮嘉赏。由此，诸葛亮对刘禅说：“臣若不幸，后事宜以付琬（蒋琬）。”诸葛亮去世后，蒋琬被委以重任，为尚书令，被封安阳亭侯。蒋琬“出类拔萃，处群僚之右，既无威容，又无喜色”，众人皆服。诸葛亮去世后，蒋琬能够协调臣僚，策划军事，很好地发挥了他的作用。

诸葛亮治蜀，以人才治，实现大治。诸葛亮挖掘、发现、推荐了一大批不同领域、不同职业、不同性格的人才。名将向宠治军有方，得到诸葛亮的赏识。诸葛亮在北伐前，上书刘禅：“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，试用于昔日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重论举宠（向宠）为督。愚以为营中之事，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陈和睦，优劣得所也。”向宠职位被提拔。向宠后来在战场上因杀敌而遇难，其



□ 石志刚

诸葛亮的用人观

忠诚任能被传颂一世。蜀部从事杨洪，被诸葛亮看重。诸葛亮曾经讲过，“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”。诸葛亮对杨洪的赏识提拔，主要是通过向杨洪咨询事情，继而发现其才。刘备率军争夺汉中，给诸葛亮送来文书，希望派兵驰援。诸葛亮就此事征求杨洪的意见建议。杨洪说：“汉中则益州咽喉，存亡之机会，若无汉中则无蜀矣，此家门之祸也。方今之事，男子当战，女子当运，发兵何疑？”诸葛亮非常赞赏杨洪的言辞，大胆提拔他兼任蜀郡太守。而杨洪在新的岗位上，没有辜负诸葛亮期望，“众事皆办”，作出新的成就。

法令严明

诸葛亮下属张裔评价诸葛亮：“公（诸葛亮）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可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贵势免，此贤愚之所以企忘其身者也。”诸葛亮治政治军有方，得益于他赏罚得当，且人皆服。尤其是他制定法令，以身作则，让众遵守，真正做到“科教严明”，“无恶不惩”。

作为刘备托孤重臣的李严，被诸葛亮推崇看重：“部分如流，趋捨淹滞，正方（李严）性也。”在诸葛亮北伐后，李严担任运输军粮的重任。然而，当时恰逢雨季，道路泥泞，李严没有完成运粮任务。李严派人去找诸葛亮，让其退兵返回，诸葛亮接受了这个意见。可是等到诸葛亮班师回朝后，李严装出惊讶的面孔说：“军粮饶足，何以便归？”。李严这样说是想脱卸自己没有承担好运粮的职责。诸葛亮将李严给他的信件全部拿出，以证其伪。李严“辞穷情竭，首谢罪负”。李严由此被贬为平民，流放梓潼

郡。再有才华、能力、功勋、地位，一旦触犯军纪、违背朝纲，必会受到惩罚。李严就是典型例子。

作为楚地优秀人才的廖立，被诸葛亮所推重，认为他是协助帝王成就大业的人。虽然受到重用，但是廖立仍然觉得怀才不遇。等到刘禅即位后，廖立改任长江水校尉。但廖立认为自己的才华名望，可以做诸葛亮的副手，却论落到李严等人的位置之下，“常怀怏怏”。等到李邵、蒋琬与他谈论问题时，他借机抨击朝政，否定蜀国用人制度和人才。结果，他的这些言语被诸葛亮所知。诸葛亮据此上奏，称廖立是“言行妄自尊大，褒贬评论众位士人”。廖立由此被废黜为平民，流放汶山郡。因诸葛亮法令严明，证据充分，惩罚得当，所以李严、廖立这样的人，虽然受到了严惩，但是仍然心服口服，对诸葛亮非常崇敬。唐太宗对房玄龄讲：“汉魏已来，诸葛亮为丞相，亦甚平直，尝表废廖立、李严于南中，立（廖立）闻亮卒，泣曰：‘吾其左衽矣！’严（李严）闻亮卒，发病而死。故陈寿称：‘亮之为政，开诚心，布公道，尽忠益时者，虽讎必赏，犯法怠慢者，虽亲必罚。’卿等岂可不企慕及之？”

作为被诸葛亮赏识的马谡，“才器过人，好论军计，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”。诸葛亮对马谡十分信任，“以谡（马谡）为参军”，舍弃刘备临终前提出的慎用马谡之建议，而且经常与马谡谈到深夜。等到诸葛亮北出祁山，派马谡为先锋，“统大众在前”，与魏国名将张郃在街亭相遇，被张郃所败。为了严明法纪军纪，诸葛亮以“违亮（诸葛亮）节度，举动失宜”的原因，挥泪斩马谡。马谡因不善指挥、临阵逃脱而接受惩罚。诸葛亮又

自请受罚。诸葛亮上疏说：“咎皆在臣，授任无方；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暗。”于是，诸葛亮“请自贬三等”，通过对自己用人失误的惩罚，来严明军纪。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，即使是诸葛亮信任的官员，如果触犯了法纪军纪，也要受到惩罚。诸葛亮说：“耳威以声，不可不清；目威以容，不可不明；心威以刑，不可不严。三者不立，士可怠也。”严明法令，实现诸葛亮以法治蜀的目标。

当然，诸葛亮严明法令，但不滥刑，十分注意执行法令的分寸。镇北将军黄权被魏军所降，有关执法部门向刘备谏言，要求逮捕黄权的妻子儿女，刘备没有同意，诸葛亮也没有同意，像从前一样对待黄权家属。因黄权品性正直，被曹丕授予镇南将军一职，封为育阳侯。有人跟黄权说，黄权的妻子儿女已经被蜀国杀害。黄权认为是假话，没有办理丧事。后来，黄权得知在蜀国的家人不仅没有受到伤害，黄权的儿子黄崇还在蜀国当了尚书郎。诸葛亮在保护黄权家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这就表明诸葛亮十分注意执法的分寸，在处理黄权家属事上，没有进行严厉惩罚、累及其家人。

量才使用

诸葛亮在用人方面有过人之处。他会根据人才的特点，将其派到合适的岗位上，发挥其作用，做到“任其所长”。诸葛亮不拘门第、不限地域、不分派别，只要有才，就会将使“才尽其力”，形成人才济济的良好局面。诸葛亮所用之人，一部分是转战各地的旧部，一部分是荆楚之才，一部分是益州人士，一部分是外来之人。

随刘备转战各地的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，皆是其旧部，受到刘备的重用，也得到诸葛亮的重用。自古荆楚出人才。诸葛亮对荆楚人才的性格、禀性、特征把握得非常精准，使用起来得心应手。襄阳出身的杨仪，才华横溢，治理政务，条理清晰；治理军务，细致入微。他的才华受到刘备、诸葛亮的赏识。诸葛亮发现他的才华后，提拔他为参军，代管丞相府事务，后升其为长史，加封为绥军将军。诸葛亮多次出兵，筹备军粮、调度部队、明确军纪等任务交于杨仪办理，都完成得非常好。诸葛亮“深惜仪（杨仪）之才干”。然杨仪“性狷狭”，不容他人，尤其是看不惯当时的武将魏延，但是在诸葛亮在世的时候，能够任用杨仪的长处，且发挥到极致，尽量避免杨仪与魏延发生冲突。杨仪因受到诸葛亮的重用，且被诸葛亮很好地管控住他的性格短板，其才华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，其性格短板没有对蜀国事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。然诸葛亮去世后，不服众的杨仪自念功高，多次发出牢骚之语，没有节制自己性格短板，最终被迫自杀。

义阳出身的魏延，作战勇敢，被刘备、诸葛亮重用。诸葛亮主政的时候，派魏延军为作战先锋部队，多次取得战绩。在打败魏国将领郭淮后，被提拔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，进封为南郑侯。魏延“善养士卒，勇猛过人”，被诸葛亮所用，且用到极致，建立了不少战功。然魏延“性矜高”，飞扬跋扈，在诸葛亮在世的时候，还能扬长补短，发扬其作战勇敢的长处，节制他性情高傲的短处。可是等到诸葛亮去世后，魏延短板无人节制，加之与杨仪矛盾公开化，最终被杀。

诸葛亮十分注重维护与益州士族

的关系，注意从中选拔优秀人才。在选拔的益州士人中，有的是学者，如秦宓等人；有的是循吏，如尹默等人；有的是军事人才，如王平等。诸葛亮十分擅长对这些不同类型人才的任用。秦宓，“少有才学”，乱世择主而侍，多次征召不至，后为刘备所用。诸葛亮将其置于学界重量级人物去对待，经常向他打听益州前辈学者的故事，以显示出对他的尊重。为了进一步显示对秦宓的尊重，公元224年，诸葛亮为吴国使臣张温饯别，“众人皆集而宓（秦宓）未往，亮（诸葛亮）累遣使促之”，非要等到秦宓来了才开宴，从中凸显出对秦宓的重视。尹默是益州的大儒，刻苦钻研古文经学，终有所成。刘备、诸葛亮进入蜀中，任命尹默为劝学从事，等刘禅被立为太子后，被任命为太子仆，教授刘禅《左传》。对尹默的任用，体现出量才使用、能级相称的特征。王平，有头脑的军事干将。王平“生长戎旅”，虽“手不能书，其所识不过十字”，但是所讲出的话“皆有意理”，后被诸葛亮逐渐委以重任。尤其是在街亭之战中，王平主意正确，排兵布阵皆有章法且有实效，被诸葛亮所褒奖并且提拔，随后，屡立战功，闻于一时。诸葛亮尽力网罗这些人才，让这些人才在合适的岗位上贡献力量，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：“西土咸服诸葛亮之能拔擢秀异也”。

诸葛亮对从蜀地以外的地方来的人才，竭诚欢迎重用。名士费祎随其伯父来到蜀郡。费祎能够公平公正地处理事务，配之以绝佳的口才，外能纵论时事、语气和缓，内能治理政务、调解纠纷，被诸葛亮重用。诸葛亮派他出任昭信校尉，出使吴国，与吴国君臣舌战，“辞顺义笃，据理以答，终不能屈”，为此引起孙权对他的称赞。随后，诸葛亮调任他为中护军、司马。费祎在协调杨仪和魏延这对文武官员关系上，发力颇多，调停有功，《三国志》中强调：“终亮（诸葛亮）之世，各尽延（魏延）、仪（杨仪）之用者，祎（费祎）匡救之力也。”诸葛亮去世后，费祎主政，保持了政权相对安定局面。

